

菇民流动与贫困山区变迁初探

李明华

(浙江林学院, 临安 311300)

摘要 本文分析了庆元菇民流动的社会经济原因、经济组织方式和形态转变机制，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角色两个层次分析了菇民流动对贫困山区的作用，最后对菇民流动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机制作了探讨。

关键词 菇民; 人口流动; 集镇; 社会变迁; 庆元县

中图分类号 C912.82, S7-05

浙江庆元、龙泉、景宁3县(市)拥有数万以种植香菇(*Lentinus edodes*)为业的菇民，具有800 a以上的制菇历史，以“香菇之源”而称誉海内外。菇民是一种季节性的流动人口。探求菇民的流动原因、活动方式和社会经济作用，对于总结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经验，丰富人口生态学和山区社会学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传统菇民流动的社会经济原因及其组织形式

庆元传统菇民系指外出福建、江西、广东、安徽和四川等地从事香菇生产的农民。据清·康熙《庆元县志》载：“庆邑之民，以制蕈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川、陕、云、贵，无所不历”。1948年《庆元县情简编》载：“全县有菇民6万余，约占总人口七成。”传统菇民大都居住在庆元县的东部和东北部，每年均有2万多名劳力较强的菇民利用冬春农事较闲的季节结伙至外地从事香菇生产，冬去春回，在外生产期间达4~5个月，属于季节性流动人口。

1.1 传统菇民流动的社会经济原因

1.1.1 人口和资源的尖锐矛盾是形成菇民流动的初始原因 浙南的菇民聚居区，大都在海拔1 000~1 500 m以上。这里年平均气温仅13~15℃，年均日照1 190~1 300 h，比非菇民区低300~500 h，而降水量达2 000~2 340 mm，高于其他地区；山高坡陡，耕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条件恶劣，1 a只能栽种1季水稻、平均产量仅为3 000 kg/hm²。严酷的自然环境，根本不能指望在有限的耕地上维持生存，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得向外求生存，外出栽培香菇成了得以维持生存的手段。

1.1.2 传统的种菇技术是菇民流动的重要条件 明太祖登基金陵之初，因祈雨素食，一时苦无下箸之物。国师刘基即进献处州(今浙江丽水)土产香菇。太祖食之甚悦，顾念龙、庆、景3县，山多田少，民甚贫瘠。刘基乘机奏请做菇为龙、景、庆3县人民专利。故3县菇民得

收稿日期：1994-05-03，修改稿收到日期：1994-11-16

赖制菇谋生，迄今800多年。

种菇须特有的树种，如柯、槠、榧、檀、栗、冬青等树种。原来，人们对之仅烧木炭、做木棍之类利用，很不经济。栽培香菇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且大都利用冬春农闲时间，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菇树虽在庆元等地有生长，但为数不多。因此，龙、景、庆3县农民凭借种菇技术，离土离乡，外出到福建、四川、江西等地资源丰富的山区种菇。虽然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但菇民以传统的种菇技术和较低的生产成本，取得一定的收入，成为菇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1.1.3 农村体制改革是菇民流动的推动力量 浙南山区的种菇业虽然有其悠久的历史，但真正快速发展却是改革开放搞活以来的15 a 时间。由于以往忽视了本地的自然特点和群众的传统习惯，采取了“限制香菇”“枪毙香菇”等一系列错误政策，菇农不能外出上山，香菇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80年代以来，香菇生产得到了重视，外出菇农大量增加。1990年，仅庆元县从事香菇的专业村有28个，外出的菇民7 000多户，达1万多人，足迹遍及云南、贵州、江西、福建等11个省(区)、200多个县(市)。1993年香菇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表1)。

表1 庆元县1951~1993年干菇产量

Table 1 Yields of shii-take from 1951 to 1993 in Qingyuan County

年 度	产 量/t	年 度	产 量/t	年 度	产 量/t
1951	163	1977	10	1986	395
1952	210	1978	2	1987	465
1953	378	1979	36	1988	640
1954	616	1980	85	1990	1 286
1955	473	1981	118	1991	2 486
1956	425	1982	205	1992	5 000
1957	329	1983	235	1993	6 886
1958~1975	—	1984	240		
1976	6	1985	320		

注：1991~1992年资料引自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庆元县志》，1993年资料引自参考文献[1]

1.2 菇民流动的组织形式

菇厂为香菇生产的基层组织。一个生产点视山林面积及经营规模大小，3个人到30多人不等。菇民外出他省到有菇木资源的山区，向当地租赁山场，订立租约，逐年支付租金。菇厂有独资经营，也有几户联办。在创厂初期，一切收获由集体核算、共同支付，最后按投工投资分成。厂主均须有一定经营管理和社会交往能力，承担风险较大。菇厂成败，收益大小，均由厂主负责。帮工一般是亲戚朋友。

菇行系解放前的菇品销售组织，开设在菇民分布区域。1941~1949年，庆元县人在福建省开有菇行258间，江西省43间，安徽省8间。菇行组织甚为简单，大都老板1人，理帐1人，伙夫1人。在每年农历10月半间，菇行老板即筹集一部分资本，付菇民作定金，然后前往择定地点，开设菇行。张挂招牌后，即由菇行老板介绍，向菇行所在地资金实力雄厚者借取大批资金，分付菇民，并预备饭食铺盖，以为菇民住宿费用。菇行老板往往在菇民青黄不接之际，向菇民放出高利贷，并预定本年产菇须归菇行销售，而售价不由菇民自主。菇民受此剥削较重。

解放后，菇民有了自己的组织——菇民协会和菇民委员会，由县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菇民代表组成领导机构。在菇民分布较为集中的地方设立办事处，派出干部，采取分片包干，定地点，定人员，定任务，定经费的“四定”办法，落实工作责任制。菇委会的主要工作职能是为外出菇民签发菇民证和香菇生产专业证；帮助菇民联系生产资源，报批香菇用材砍伐计划，协助外出菇民解决山场和菇业纠纷案件，保护外出菇民利益；沟通香菇生产的市场信息和资源信息；提供香菇生产技术服务等。

如果说解放前菇民流动是采取菇行+菇厂的组织机制的话，那么解放后菇民流动是菇厂+菇协+菇民服务组织的组织机制。

2 菇民流动的新形态

运用社会生态学家邓肯提出的人口、组织、技术和环境框架理论分析，菇民其实是在人口和生存环境压力下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80年代以前这种生存方式所采取的技术手段是粗放的，市场流通组织是低级的，因此这种型态的菇民流动是在原始技术、劳动力密集和消耗大量的木材资源等情况下的一种低层次的劳动力转移方式。80年代以后，这种初级层次的劳动力转移方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于：由于森林资源（木材资源）的急剧减少而带来的菇民与当地的纠纷增加；由于制菇技术落后而带来的效益低下问题；由于市场流通组织的单一性和分散性而带来的菇价不稳等问题。针对这种挑战，80年代以来，庆元县委县政府采取的改进技术和建立区域市场的努力，改变了菇民流动方式，促进了菇民流动新型态的出现。

2.1 制菇技术的改进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益

庆元菇民老式制菇大都以“砍花法”进行生产，香菇收成的好坏全视天气、菇木资源和菌种的状况来决定，因此，生产的效益受自然条件严重制约。虽然菌种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益，但资源的浪费仍是严重的。科技工作者改进产菇旧法，从段木栽菌、木屑压块、人造菇木露天栽培到以草代木，利用嫩草、芒秆制菇，实现了制菇技术的4级跳。1986年以来，全县实施袋料制菇星火计划，推动了庆元菇业的大发展。技术的改进对于菇民流动这种特有的山区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表现在：其一，原有老式制菇的菇民流动依菇木资源的分布而定，主要流向省外山区。袋料制菇技术推广以后，菇民可以在家乡组织生产，带动了境内菇业生产。1992年县内62.8%的农户采用袋料制菇法。其二，老式制菇的劳动力主要以青壮年为主。采用新法以后，除青壮年劳动力以外，老、幼、妇等家庭劳力也得到了充分利用。其三，改变了老式制菇的粗放经营局面，形成家庭为单位的初步集约经营。其四，提高了木材利用效率。老式制菇平均每千克木材产菇3.50g，新式制菇每千克木材产菇接近了日本的水平^[2]。

2.2 区域市场的形成对菇民流动和菇业发展的影响

资源利用技术的改进，提高了香菇产量，但只有产品而没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同样也形成不了经济优势。过去菇民在外地栽培的香菇，均由当地的菇行收购销售，比较分散；本县境内的香菇产量有限，菇品的购销都由供销社独家经营，制约了市场的发展。1986年人造菇木露地栽培技术的推广，使香菇产量成倍增长，大量菇品寻求销路，推动农民介入流通，打

破了供销社独家经营的局面，在庆元县城松源镇形成了“香菇街”。为推进香菇生产的发展，庆元县府有关部门筹集资金400万元，于1991年12月建成占地 $6\ 666\text{m}^2$ ，面积 $10\ 500\text{m}^2$ ，摊位150个，可容纳上千人进场交易的“庆元香菇城”。香菇销售流通进入了专业化、正规化阶段。

专业化、正规化香菇市场的建成对于菇民流动和菇业发展的影响有三。一是菇民队伍出现了职业分化。专业化的香菇市场吸引了更多的原先专门制菇的农民开始涉足购销流通领域。香菇市场形成以来，全县已有4 000多人加入灵活销售、四面出击、八方定点的购销队伍。二是香菇市场建成后，由于价格稳中有升，辐射功能越来越大。昔日的市场仅以销售庆元香菇为主，而现在近邻县，甚至边远省县的香菇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1992年香菇市场交易量为4 102 t，其中有1 230 t来自外地。三是扩大了国内外的香菇销售量。1 600多人的外出销售队伍长年累月，走南闯北，在上海、广州、深圳、福州、南京、北京等18个大中城市开设销售点，1992年内销2 687 t，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通过精选、加工、包装后，先后与日本、美国、新加坡等10个国家建立了外贸业务关系。1986年外销数量仅17 t，1992年发展到1 409 t，比1986年增长82.9倍，占整个市场销售额的34.0%，出口创汇超出1 000万美元。

资源利用技术的改进和区域市场的形成改变了菇民流动的型态，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3 菇民集中分布区域的社会变迁

落后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是发展社会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它包括个人行为的现代化为标志的个体变迁和以开放的专业分工为特征的社会系统变迁两个层次^[3]。传统的菇民地域流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落后山区封闭的同质结构，但冲击力量是微弱的，而建立在资源利用技术现代化和区域市场基础上的菇民流动才给庆元这个落后山地社区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庆元县制菇传统具有800多年历史，但80年代以前仍然处于贫困县的行列，80年代以后，才逐步改变了原先的贫困落后面貌，其原因也在于此。

新型态的菇民流动对于菇民社区结构的变迁促进作用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

3.1 经济结构的变迁

菇民集中的龙泉、庆元、景宁3县(市)都属于浙江省的贫困山区，远离中心城市，区位条件较差，交通不便，资金技术缺乏，信息不通，造成工业发展不快。1984~1991年7年间，全省山区县的工业产值比重平均增加了35.0个百分点，由16.0%提高到51.0%。而庆元县由20.0%增加到28.0%，仅仅增加了8.0个百分点。庆元社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的份额明显低于浙江全省山区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期，庆元县香菇产量由1979的36 t增加到1991年的2 486 t，外贸出口达800 t，香菇产值超亿元，为同期社会总产值的1/3，为同期工业产值的20.0倍，成为当地一大支柱产业。由于香菇产业的发展，全县每个劳动力的人均产值水平大大超过了全丽水地区的平均水平(表2)。

3.2 聚落体系的变迁

由于区域香菇市场的形成，主导产业的建立，带动了为香菇生产服务的机器制造、包装加工、运输服务、邮电通讯、仓储及旅游等非农行业的发展，加速了资金、人口等生产要素

表2 劳动力人均产值对比表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average output value per labour

年份	平均每个劳动力社会总产值/元			以庆元为1的比较系数		
	庆元县	丽水地区	全省农村	庆元县	丽水地区	全省农村
1983	1 326	1 096	1 743	1	0.82	1.31
1991	3 700	2 653	6 799	1	0.72	1.83

注：根据1984、1992年《浙江农村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的集聚。集镇这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非农社区不断发育和兴旺。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庆元处于1县1镇的落后状况，镇人口的比例只有9.3%。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时，有了3个建制镇，镇人口的比例为18.0%，超过了全省山区的平均水平。1993年，新增贤良、左溪、黄田、屏都4个建制镇，镇人口增加5 000多人。原来的县城——乡——村的单一聚落体系介入了集镇这一新型的聚落实体，初步形成了开放型的聚落体系。

3.3 职业结构的变迁

菇民长期来以种植香菇为主，职业角色局限于第1产业。随着市场流通环节和条件的改善，大量菇民开始介入非农产业（表3）。1991年与1982年相比，庆元农民从事第1产业的人员减少了6.0个百分点，从事第2产业略有减少，从事第3产业的增加了7.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交通运输服务行业的增加了3.5个百分点。这与庆元县产业结构中工业落后的状况是一致的。这也说明，随着流通环节的加强，第3产业就业人员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菇民已从单纯的从事种菇业的地域流动开始向产业职业之间的流动转化，开始了职业角色的转移。

3.4 菇民文化价值观的变迁

传统菇民受生产技术的限制及自然条件的约束较强，制菇过程，崇拜人工种植香菇的创始人吴三公为“神”，戒忌很多。菇民文化中自然崇拜成分较重。陈国钧曾指出，一般菇民，守旧之性，牢不可破，并不相信新法改良为真，认为不过空谈而已。可见传统菇民的守旧保守思想之重。80年代，庆元实施袋料栽培“星火计划”以后，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1992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792元，香菇单项收入达542元，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随着经济收入的明显增高，菇民提出了重视科技，提高文化水平的要求。庆元全县出现了100个发展袋料香菇的专业村，1.5万户专业户，65.0%的农户采用新法制菇。并出现了菇农自费学日语，到日本学技术的典型。岭头乡是菇民最为集中的乡之一，原来，至少3/4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近10 a中，全乡人均集资60元，兴建改建学校14座，达到“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目标。随着菇民职业构成的改变，改变了“无商不奸”的传统观念。一大批懂生产、会经营的人才脱颖而出。新技术的传播和市场体制的推动使菇农原有的文化价值产生嬗变，变迁与新思想的影响同时发生。

表3 庆元县劳动力就业结构比重（%）

Table 3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Qingyuan County

年份	第1产业	第2产业	第3产业	其中从事交通 运输服务行业	
				运输	服务
1983	81.6	4.7	7.7	2.7	
1991	81.0	4.1	15.0	6.2	

注：根据1984、1992年《浙江农村经济年鉴》计算

4 结语

庆元菇业的发展为我们寻求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山区的发展必须从区域经济系统中确立自己的主要产业；主要产业的选择必须立足本地资源，发挥经营传统的特长，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市场来牵导。

山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把重点放在资源优势的转化上，而技术的更新，区域市场的牵导，服务体系的完善是劳动力转移的保障条件，由此推动传统落后社区的变迁。

集镇的发展是山区社会变迁的活力点。它依赖于开发农业的扎实基础，依赖于活跃的市场流通条件。但仅此是还不够的，还得依赖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实现资源增值，发挥集聚生产要素之功效，并且在强调资源转化的同时注意资源保护，维护山区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

致谢 本文写作得到了单光新教授的指导和钱杭园、甘清华等同志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参 考 文 献

- 1 田志伟.联合国专家推荐庆元模式.杭州日报,1994-11-08(9)
- 2 徐赞海.菇乡如今奏新曲.丽水日报,1989-10-04(2)
- 3 [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著,王晓毅,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1~15

Li Minghua (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Lin'an 311300, PRC). Shift of Mushroom Cultivators and Transformation in Poor-developed Mountain Areas. *J Zhejiang For Coll*, 1995, 12(1): 87~9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ocial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shift of mushroom cultivators in Qingyuan, its form-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organizing patterns of economy as well. Using the methodology from sociology, the paper also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shifting population on the impoverished mountain areas with respect to social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role. In the end, it tries to expla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caused by the shift of mushroom cultivators.

Key words: mushroom cultivator; shifting population; town; social transformation; Qingyuan County